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Zupu Suojian Wenxue Piping
Ziliao Zhengli Yanjiu

族谱所见文学批评 资料整理研究

张廷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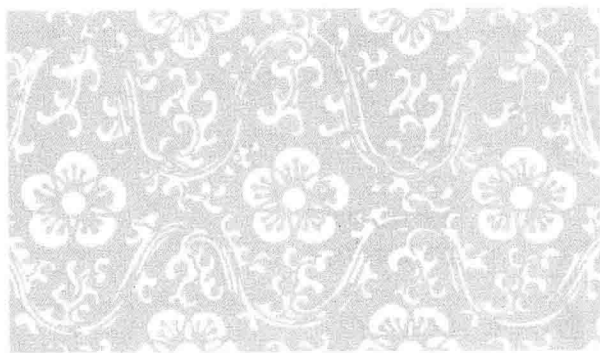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Zupu Suojian Wenxue Piping
Ziliao Zhengli Yanjiu

族谱所见文学批评 资料整理研究

张廷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族谱所见文学批评资料整理研究/张廷银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618-3

I. ①族… II. ①张… III. ①氏族谱系—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②氏族谱系—研究—中国—民国③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 IV. ①K820.9②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1584 号

责任编辑 杨 华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页 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18-3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绪 论	1
内编 论析编	37
第一章 阅读倾向显示对作家的认同度	38
第一节 不求甚解与字斟句酌:两种读书态度和方式	39
第二节 秦汉唐宋大家是重点阅读对象	44
第三节 独出一格的个性化阅读	54
第二章 写作宗尚反映文学倾向	67
第一节 乡村文人散淡不失认真的写作精神与态度	67
第二节 汉魏唐宋大家是首选写作宗师	72
第三节 独抒性灵、不拘主流的写作风格	76
第三章 人生取向寓含作家评鹭	82
第一节 正直率性作家仍具普遍人生垂范意义	82
第二节 陶渊明成为普遍尊崇的人格模范	86
第三节 陶渊明与底层文士的心灵对接	91
第四章 诗文序赞中的作家作品评论	101
第一节 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作家	101
第二节 关于唐宋元明清作家及作品	116
第五章 析评诗文篇句彰显个性批评	128
第一节 与普遍认识相一致的理解	128
第二节 有别于普遍认识的理解	133
第六章 论说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发展史	141
第一节 关于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141

第二节 概论各代文学发展	154
外编 资料编	169
一、阅读倾向显示对作家的认同度	171
(一) 阅读态度及方法之一:博览群书、不求甚解	171
(二) 阅读态度及方法之二:精读细研、钩章棘句	174
(三) 读书方向 and 选择	176
二、写作宗尚中所体现的选择倾向	200
(一) 关于写作精神与态度	200
(二) 有关写作宗奉的准则	207
三、人生取向所体现的作家评鹭	229
四、诗文中论作家	244
五、对诗文篇句字词的析评	273
六、对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283
(一) 德行与文艺、性情与词调	283
(二) 作文步骤、写作与读书	293
(三) 其他问题	300
七、关于各代文学发展的评论	312
(一) 历代文学发展	312
(二) 断代文学的评论	315
后 记	330

绪 论

族谱,或曰家谱、宗谱,“乃一家之史”^①,主要记载一个家族中的世系、迁徙、人口及每个人的生卒、婚配、事迹等,偶尔也收录族内人的诗文作品及族外相关人的题赠等。所以,我们现代人使用族谱文献,主要是查阅有关人的生卒、世系及生平事迹,而较少涉及除此之外的资料信息。即使是寻找关于某人读书、作文活动的记载以及相关诗文汇徵,一般也只关注其所反映的人物精神活动以及某个家族所产生的各种文献,很少意识到其中还有十分丰富的文学批评资料。而恰好就是这些文学批评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底层文士阅读和批评中国文学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族谱中从事文学批评的底层文士

作为文学阅读和批评活动中的底层文士,是相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政治地位或显赫文绩的人而言的。对他们身份的界定,既针对于其社会地位,也针对于其文化地位。就其社会地位言,他们不享受朝廷俸禄,不属于国家公职,是一介布衣。就其文化地位言,他们的科第不过举人,甚至没有任何功名,是一介寒儒或童生。而之所以称为文人,就是他们与那些目不识丁的蒙昧之辈相比,尚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读写能力。

姚慈惠《水浒传之社会学的分析》^②一文,把中国古代社会各阶级分为五个:

1. 独裁者元首。
2. 上层士大夫,包括官僚、政客、学者。

① 章学诚:《宜兴陈氏宗谱书后》、《与冯秋山论修谱书》,《章学诚遗书》卷十三,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姚慈惠:《水浒传之社会学的分析》,《社会学杂志》1932年7月。

3. 中层士大夫。包含上层士大夫之告老或退伍、落伍者。

4. 下层士大夫。一为土豪地痞阶级,二为江湖阶级,三为小地主、小资产阶级及自耕农。

5. 总集合阶级,即农工苦力及无产阶级。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阶层》,则把清代的社会等级分为皇帝、宗室贵族、官僚缙绅、绅衿(有功名而未仕者)、凡人、雇工人、贱民七个等级^①。如果要寻求对应,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底层文士,就大体属于姚慈惠所谓下层士大夫和总集合阶级,以及经健所谓的绅衿、凡人、雇工人和贱民中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上曾经用“庶民”这个概念来泛指普通大众,《诗经·大雅·灵台》所谓“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之“庶民”,就指那些接受统治并要承担一定体力劳动的普通人,即孟子所说的“劳力者”。因此,普通人永远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当代的西方社会人类学研究,也在与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层相对的背景下,来划定庶民(subaltern)的范畴,如美国学者斯皮瓦克认为:庶民“包括在这范畴内的各种社会群体和成分,体现着全体印度人与所有那些我们称为‘精英’的人之间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形成的人口差异。”^②斯皮瓦克特别强调了庶民与精英的对立与差异。而与精英文人社会及文化地位的对立与差异,也正是我们划定底层文士的最基本尺度。那些出身比较贫微、社会地位曾经较低的人,后来却成为了声名显赫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底层文士范围。

就职业情况而言,底层文士主要担任乡学私塾中的塾师教官,少数的或经商、或务农、或行医,有的则无任何固定职业甚至近于无业游民。古代知识分子通常是以科举为仕进之必然途径,但这条道路又不总是对每一个读书人都敞开,大部分人还是因仕进无望而最终放弃这种人生追求。“弱冠为诸生,……好学不辍,于典籍无所不窥”的邹梦龙,“竟困于科举,老诸生间”^③。而在被挤出这场角逐之后,不少人出于生计或者蓄势待发的考虑,转入了处馆授徒的塾师职业。嘉靖时冯从吾的启蒙老师萧九卿就是因

①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阶层》“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② 刘健芝、许兆麟选编,林德山等译:《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41页。

③ 赵南星:《味檠斋文集·邹先生传》。

为“累试秋闱不售,后弃去,设科为童子师”^①;惠安士子李英玉,亦因“试于乡不售,退而教授于城南务巷,以诗文自娱”^②;明末上海张应春“为诸生,屡试不售,遂弃去,训蒙作活,不谈时艺,曰:‘时艺吾不售矣,以此教人能不自愧。’”^③清人钱德苍《解人颐·寓意集》所收《村学究自叙》,就非常直白地道出了那些村学教读的从业缘由及内心苦闷:“利欲驱心万火烧,世途扰扰几欢悲。漫言富贵书生分,谁解青袍误老儒。小子不是别人,乃是村学堂中一个先生是也。每忆少年时,通今博古,焚膏继晷,窗前勤苦,十余年学成文武艺。几向棘闱酣征战,龙门点额暴腮争。奈命途多舛,时运不济。避曲江之车尘,无长门之际会。因此上田园废尽,身口不支。正是空余文字三千卷,一字何曾疗得饥。”科举失利的士子都愿意把屡试未售的原因归结为时运不济,恐不尽然,不过当他们这样理解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已经彻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对人生的重新规划。处馆授徒这种职业虽然收入不高,地位也很低,但仍然是比较“对路”的选择。不但可以缓解生计之困,还可以有机会继续游心于艺文之中。有些科举失利后转向下帷授徒的人,还把授徒视为自己未了追求的延续或转移,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十《朱隐士墓表》记载:“昆山有隐士曰朱日南,……隐士幼故未知书,甫成童,忽慨然自奋,遂以儒业世其家。……及年渐长,人自百里外延致于塾,而隐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赖我而有益,亦不为独善矣。遂以授徒为业。”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大部分处馆塾师都有条件、有能力研读中国文史,他们构成了底层研读中国文学的主力军。

还有一些科举失利者以及其他未曾参加科场角逐的人,则把事农、从医、星卜、经商等作为职业选择。因为耕读传家自古以来就是文人所宣扬甚至向往的生活,事农一业当然属于最合理的生涯抉择,明代中叶章丘弭氏对其夫谢惟馨说:“吾家赖以生者,不过读与耕耳。君于读书之暇,何不于田省耕,劝戒勤惰,以望有秋,以办两税之需,以赡一家之养。”^④可以说,耕与读对于古代知识分子就是相伴而行的两种举动。耕作之暇读书和

① 冯从吾:《少墟集·萧沈二先生传》。

② 彭韶:《彭惠安集·哀李英玉先生词》。

③ 李延星:《南吴旧话录》卷上。

④ 李开先:《闲居集·淑媛弭氏墓志铭》。

读书之暇耕作,都是非常自然的行为。

行医和卖卜并不是士人的人生追求,但这两种职业仍然与知识和文化(尽管其中也包含着伪知识、伪文化的可能)相连,是士人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行商一途虽然在重本轻末的中国,一直是文人所不齿的职业,但在明清以后由于社会观念的变化以及生计需要,有些读书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的自我解释是“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各就所志,期无忝所生而已”^①。2007年重修的《张氏宗谱》^②卷一辑录张明远光绪六年所撰《恩第二叔大然暨婶母马孺人合传》,称张永信(字恩第)“率诸弟以农贾,训子侄以诗书”。所以,历史上就有一些读过书而行走江湖的医郎、卜师、商人以及其他游民,也曾经参与了业余的文学创作与批评行列,成为文人阶层的较边缘群体。

综合上述各种情形的底层文士,可以发现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属于地位比较低下、力量比较微弱的群体。姚慈惠《水浒传之社会学的分析》虽然充分肯定了下层士大夫的社会作用,指出:“当天下太平的时候,约束全国最有力的为上层士大夫,一旦天下有事发生则下层士大夫阶级为最有势力。但下层士大夫阶级中最有魄力者为江湖份子。他们算是乱天下的工具,其术可以左右下层一切阶级。……考历代史,中国朝代之更换,都是由这班人乘着天下有乱而闹出的勾当;中国历代英雄豪杰也是这班人物代表,中国整个社会差不多完全为这班人支配。”他这里主要是就社会变革和政权轮替而言的,并不明确包含文化教育。而且,那些直接参与了改朝换代活动的下层士人,在改朝换代完成之后往往处于社会上层,因此,他们也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底层文士。真正的始终处于底层的人文,历史上除了族谱,没有其他任何文献资料关于他们的记载,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更不可能提到他们。但从族谱文献看,这些人确实活生生地存在过,而且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过阅读和批评的过程。当我们从更广的视角来认识古代文学的价值及流播时,这些普通人的阅读和接受经历就显得十分珍贵。因为虽然其他历史文献没有真切的记载,但中国文学能被更多的人所

①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六百四十六条,黄山出版社,1985年。

② 张世林等修:《张氏宗谱》,2007年影印本。

接受并得以广泛流传,他们在其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全面、系统地整理这群人的阅读接受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而笔者对这层学术意义的理解,则始于对大量文献的认识。

在大量翻阅了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数千种家谱文献,并就底层文士阅读和接受古代文学的情况做了细致的排比分析后,我发现这些资料本来是各自散列的,但如果按照一定的线索将其串接起来,就将为古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展示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古代文学被广泛阅读和普遍接受的真实过程,了解古代文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如此,那些只有初级文化水平、没有多少政治地位的人,往往深刻地影响着某一地域的公众文化活动,他们的文学活动,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底层或基础文化的发展过程、表现方式以及记录方式都将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文化权力之下移以及文化发展之多极化,始于宋而成熟于明清,明清及其以后方有群体性的底层文士存在,因此我们这里也只考察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相关情形。同时,由于现存家谱文献主要为明清及民国时期所修,其中所涉及人物如果是明代之前的,通常都会比较明确地说明资料来源于某部史籍,若不做资料来源的说明,又没有人物具体年代的说明,则基本上都是明清或民国时期的人物。这样,我们此处所说的底层文士也基本是在明清两代的时间范围内。

二、古代文学评论的生态平衡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从孔子的“诗论”开始,迄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悠长历史,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仅就相对较晚的批评史和接受史研究来说,如果从陈钟凡 1927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算起,现在也已有八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出现的专著达百部之多。这些著作中既有属于通体通代的,也有属于分体断代的。有的以理论的建树见长,有的则以资料与理论的博综兼容为特色。理论与资料的同步突破和相辅相成,是文学批评史和接受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体现。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缺憾和不足,从而留下了可以继续发展的空间:

第一,因为研究者们普遍重视揭示文学批评与接受活动的规律,导致

具体批评和接受过程的描述显得比较薄弱。而规律性的内容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的差别毕竟有限,因而在各个批评史和接受史著作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常常只是体现在内容的多寡和评价角度的不同上,最后的结论、运用的材料以及研究的结构,则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了研究的重复与雷同,成果本身缺少鲜明的特点,另一方面则容易使文学批评和接受活动陷入程式化、片面化的境地,不利于对文学批评与文学接受过程的全面深入理解。

第二,限于研究思路,目前的研究在材料范围方面主要集中在历史上那些“主流”的人物和批评活动上,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批评家以及其他重要人士所提出的批评和接受,而那些处在主流之外的文士对于古代文学的批评和接受状况,则被遮蔽、被忽视,使历史的记录和研究同时出现了盲点。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以资料广博而著称的批评史著作,但也主要体现为对诗格、诗句图以及诗话的辑佚和运用,未见来自民间的批评资料。后来的批评史著作均未能超出这个范围。就文学接受而言,有论者曾将文学接受分为贵族的接受、文人的接受和大众的接受三种形式^①,然而在实际的批评史和接受史研究中,普通读者包括中下层文人对于文学的理解与接受,常常被有意忽略了。一些研究成果虽然也涉及民间接受唐诗宋词等内容,并注意到了优伶歌妓竞唱唐诗、有井水饮处即歌柳永之词以及民间广传演义小说等材料,但这些情况早已为众人所周知,而且材料本身也出于著名文人的笔下,不具备足够的民间性和广泛性。更有一些学者以为民间的底层的评论比较粗粝、不够严密,因此视其为无足轻重的无用之物。这其实是不客观也不科学的。民间的评论固然还不够谨严精密,但未必没有可取之处,其粗粝的形态往往是因为出于原始和实用的成分较多,没有进行精致的美化和加工。周作人的一段话很值得今天再回味。

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抵主意在于实用,但其对于季节的反应原是一样的。在中国诗歌以及绘画上这种情形似乎亦很显著,普

^① 参尚学锋等著:《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绪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

通说文学滥调总是风花雪月,但是滥调则不可,(凡滥调均不可,)风花雪月别无毛病,何足怪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与看见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种,同是对于物候变迁的一种感觉,这里不好说雅俗之分,不过实者为实用所限,感触不广,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在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①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民间传说中对于古代诗人作家的改造性理解。流传于今黑龙江阿城地区的传说称,一次朝鲜的诗人想与李白比比高低,李白装作一个渔夫,看了看江中的景色,随口念了一首小诗“pia pia 一小舟,ri ri 水上流。eng eng 推不动,zi zi 浅住了”,请这位朝鲜诗人写出来,结果其中几个完全是象声的字,朝鲜诗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于是就不再坚持去会李白,而直接回国了^②。这个传说到了辽宁鸡西地区,朝鲜诗人换成了南绍诗人,李白的诗则为:“飘飘一小舟,溜溜顺水流。哼哈齐使劲,滴嗒度春秋。”南绍诗人居然写不出“滴嗒”二字,也悻悻而归了^③。这样的情节和这样的诗篇,一看就是民间人士斗智斗法的游戏,但传说居然把它们安在李白头上,既说明李白被民间的认知程度,同时也反映了民间对李白的具体理解——他就如同民间的一个智慧之士既超常又平常。而顺着这个思路,民间也还流传着更俚俗的李白诗作,如“一个林字两个木,二字同旁柁和柱。不知哪根木做柁,不知哪根木做柱”、“一个爻字两个×,二字同旁你和她。不知哪××着你,不知哪××着她。”“一个从字两个人,二字同旁朋和脸。不知哪人够人朋,不知哪人丢人脸。”^④这几首连打油诗都够不上诗句,实在是太俚俗了,甚至有些粗俗和鄙俗,尽管有学者称李白为“古惑仔”,但想来他还不至于去写这样的句子,即使写过,历史上也不会得到流传,而民间之所以这样流传,足以说明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李白既是伟大的,同时也是很庸常的,他也会象民间所流传的那些粗通文墨的人,偶尔

① 周作人:《知堂书话·清嘉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5—516页。

② 张大伟主编:《阿城民间故事集成》,阿城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88年,第75—76页。

③ 张超主编:《鸡西民间故事集成》,《黑龙江民间文学集成丛书》,1989年,第40—41页。

④ 《隆化民间故事选》,隆化县三套集成办公室,1987年,第66—67页。

在文字游戏中显示自己的小智慧。与李白所受到民间的理解相似,唐代另一位诗人孟浩然,也被民间“改造”成了富有普通人生活情趣的诗人。流传于今天四川奉节县永安镇的故事说,孟浩然从湖北携妻春游至四川,投宿于白帝城一家客栈。夜间恰逢一场风雨,便写了《春晓》一诗。他写好之后,非常惬意,便倒头大睡,鼾声如雷,吵醒了旁边的妻子,妻子非常生气,给他回了一首:“春眠不觉晓,心中烦死了。你的鬼蹊蹊,不扯好不好?”夫妻俩在屋里的动静,吵醒了屋外房檐下露宿的叫花子,他一听孟浩然妻子所对的几句便是所谓诗,便随口吟道:“春眠不觉晓,虱子饿格蚤。老子逮几回,个都没逮到。”^①《春晓》一诗本来非常清新雅致,但加进民间的这一层渲染,就没有多少典雅,生活的意味则增加了许多。这使我们也想起了几年前流行于中小校园的改版《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打了灭害灵,死亡有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挂上猪笼草,不知死多少。”

第三,因为忽视了民间和底层的文学评论活动,目前的文学批评史和接受史所得出的结论常有以偏概全之嫌,其中所概括提炼的规律性认识不一定全面。批评史和接受史的进一步发展,当然需要在深度上继续有所加强,更需要在层次和广度上得到较大的拓展。只有对实际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涉及底层民众的活动不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不断逼近文学批评与接受的实况及规律。在这一点上,周作人的观点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说:“学术、艺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少数人的思想虽是合理,而多数人却也就是实力。所以我们对于文化似乎不能够单以文人学者为对象,更得放大范围来看才是。”^②

第四,作为一个国家或集体中的共有成分,文人精英与文化底层之间其实是互相通融和双向互动的。曾有学者研究指出,作为一种称谓,“姪”最早出现于民间。两晋南北朝时期,精英阶层撰写的文献资料中其应用已渐趋增多,但与表达同一含义的传统称谓“兄子”、“弟子”相比,仍处于劣势。唐宋时期,“姪”在文献资料中取得与“兄子”、“弟子”相等的地位,甚

① 游翔主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奉节县卷,《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奉节县卷编辑委员会,1989年,第67—68页。

② 周作人:《日本管窥之三》,《风雨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至出现于法律规定中,而此期民间抄写的丧服制度中,“姪”则完全取代了“兄子”、“弟子”。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并改造精英文化的现象^①。傅斯年先生也指出,尧舜南面无为的传说本来是在儒家系统之外先由民间产生并流行的,“照儒宗的人生观,文献征者征之,本用不着造这些名词以自苦;无如这些名词先已在民间成了有势力的传说,后又在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故非取来改用不可”^②。儒宗作为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主流,必要时也不得不向民间汲取智慧。当然,从文献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精英向底层的传输和引导,专业的文学评论实际承担着对于普通阅读者的引导和指导任务^③,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民间评论的“从众”特征^④。从我们所掌握的大量家谱资料中,也确实可以看到普通人向正统和精英靠拢的倾向。来自于中下层读者的新异观点确实不多,更多的时候是对主流观点的附和和响应。研究《红楼梦》接受问题的学者也曾指出:“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特殊读者,他们对《红楼梦》的接受并非完全对立相反的,而是交叉重合的,有时甚至是一致的。”^⑤但这种附和响应与人云亦云的盲目趋同截然不同,它是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对普遍观点的主动选择,如果说这些观点反映了中国文学与文化基本要义的自然要求,那么,选择这些观点就是对中国文化主流的认同和传播,其意无奇,厥功则甚伟。中国文化的最基本内涵和最主要形式,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典籍和一批重要人物上,但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则必须依赖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才能实现。中国的文化典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遭到了无数次的损毁,有众多的文化名流则遭受了无情的摧残甚至戕害,但中国文化的内容并没有被摧毁,反而更加丰富和精彩,毫无疑问,是由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默默地承担了文化遗产的使命。中国文化能有如此悠长的传统和旺盛的生命,我们要记住那些为之奋斗的勇士和泰斗,更不能忘记无数

① 参见韩树峰:《中古时期的“姪”与“兄子”、“弟子”》,《历史研究》2010年第一期。

②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79页。

③ 李根亮云:“(批评家)的接受往往引导着普通读者的接受方向。”《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引言”第8页。

④ 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绪论”第5页。

⑤ 李根亮:《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引言”第8页。

非职业、非专业的文化传承者、实践者。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专业的文学评论者也应该从普通的阅读者身上得到某种启示和支持。根据我们的大量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认识:与上层的专业的文人对中国文学的评论相比,最底层民众对于中国文学的最普通认识,与自己的生活结合得更为密切,往往从实际的生活需要和经验出发,去解读作家的写作行为和作品意蕴,因此显得较为直观和随意,自然难免零散、庸俗和粗粝。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是没有经过打磨斟酌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认识又往往更接近作品的本质,因而给专业的评论者以意想不到的启发。专业评论者如果能够积极地从民间的普遍倾向中寻求更直接的支持,就会有充分的把握和理由提出或坚持某种文学见解。周作人就曾说过:“我们研究文学,单看一方面是不够的,老庄孔孟不过代表中国思想的提高一点,但不能代表中国民众思想的总数与平均数,这是从各方面整理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先整理下等东西,才可以再去从事纯文学的研究。”^①“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②试想想,如果没有民间对陶渊明的广泛捧爱和欣赏,那些身居高位而一旦失势的贵人还能心安理得地把陶渊明奉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吗?我们还能很有把握地说陶渊明是一个最善于描写普通人生活和心理的诗人吗?新西兰从事语言史和古代书写传统研究的学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甚至把“杰作标准由普通读者而不是由精英人士确定”,视为在二十一世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箴言^③。此论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他确实看到了普通读者对于一部作品价值的影响效果。

笔者一位从事一般文化工作的朋友,其专业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当笔者提及学界关于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南山”所属的争论时,她脱口说道:古代的房子坐北朝南,出门所见自然就是南山,而不一定专指某个南山或北山。这种从古代民居建筑原则出发的解释,也许并不完全符合陶渊明“南山”之实情,但却更有生活和历史的基础,

① 周作人:《关于通俗文学》,《周作人批评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01页。

② 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③ 《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2页。

似比专业评论者的无休止争论更为自然合理。她还说：一个陶渊明也许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境界和特点去诠释。这几乎就是非常专业的专业评论。笔者有感于此，曾仿赵翼《论诗绝句》，拟诗一首：“渊明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解人出，乃知新意在民间。”

2009年《南方周末》报道称，诗人北岛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各层、各界的人民对诗歌阅读和创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崇敬，因此那几年中国的专业诗歌创作成就也最高。而九十年代末以来文坛所呈现出的空前消沉，则与全社会对文学的普遍冷淡直接相关。北岛的评论再一次说明文学的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相互融通的极其重要性。所以，当我们极力提倡专业文学批评的时候，亦不可完全忽略民间的非专业批评。

200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文化”栏目有《在大唐的村子里，活着》一文，介绍当时正上映的影片《我的唐朝兄弟》，该片的导演、编剧杨树鹏自述：“我一直对古文、古典文学有兴趣，小学三年级，我看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历史书就想写一本历史书，拿了一个小本子，写了四个字‘唐诗初探’，我爸爸看了笑得不停。”尽管他没有写完他的“唐诗初探”，甚至连高中都没有读就当上了县城的一名消防员，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唐史和唐诗的理解：“唐代是中国文化最为丰厚的，杂糅并蓄，海纳百川，吞吐量最大朝代，唐前后都没出现那么丰富的多重文化。宋代以后中国的精神渐渐趋向内省、保守、清心寡欲，宋明的理学在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没有那么恣肆汪洋，唐以前更开放粗狂，我如果想张扬一种得意汪洋、粗狂豪迈的气质，那么唐代是适合的。”“我原来写过这样的故事，高适、李白这些诗人去送人，先送到咸阳再送到天水，最后送到敦煌，送到敦煌以后说咱们坐一下，古代诗人就是这副德行。”“住在一个青楼里，大家天天嫖妓写诗，把墙壁都写满了。再后来每个人都染了一身性病，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小姑娘有一天突然死了，一帮唐代诗人开始破案……我会拍这样的历史电影。”“这个是真历史的。穿着宽袖子的长袍大衣在那里望着月亮，那些都是假的。”“唐代的生活拉到现实中来，不是白衣飘飘，一下就飞到树林之巅。”只有初中教育背景的杨树鹏对唐史和唐诗的认识，有与作为教材的历史、文学书籍相一致之处，也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特别是对李白等唐代诗人的理解，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前几年一个专业的文学评论者所提出的李白的古惑仔形

象。很难说这位专业的研究者与非专业的杨树鹏之间是否有互相影响的情形,但他们对唐代诗人先后产生那样的理解,本身就是精英与民间互通信息的表现。因为杨树鹏所主导的这部影片“荒诞不经却又绝无山寨般的恶搞,带有诗性,却又不是‘文艺大烩片’。”它是杨树鹏根基于唐传奇、唐诗而形成的对唐史和唐代文学的个性化认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霍国玲、霍纪平这两个非文史专业的业余学者所撰写的《红楼解梦》^①一俟问世,便遭到了红学界的大面积讨伐,因为它在索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径称《红楼梦》的作者是曹天佑。曹天佑之至爱竺红玉被雍正选入宫中又做了他的后妃,曹天佑与竺红玉私下相通并最终用计毒死了雍正,而《红楼梦》一书正是曹天佑为了谴责和报复雍正而作。霍氏姐弟所提出的这个观点固然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他们不囿成说、独辟蹊径、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于专业的红学研究有其独特的启发意义。他们不带太多功利目的,完全凭任个人兴趣进行研究的心态更值得钦佩,所以红学家胡文彬先生以难得的姿态毅然为该书写序,并热情呼吁:“红楼不废百家言,红学研究也应该兼容‘索隐’这一家!”^②红学中索隐一派当然并不始于霍氏兄妹,更不以他们二人为代表,因为此前的俞平伯等人才是真正的索隐派先锋。不过,霍氏兄妹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反映了民间视小说为史书的阅读倾向,不仅过去如此,在今天的底层读者中,这种倾向依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普通人如此欣赏刘心武任意解读《红楼梦》的重要原因。而普通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和红学专家理解不同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因为红学家往往是从专业的职业的角度进行理性的、科学的分析考察,而普通读者则“更愿意从个人的生活体验的角度来谈论《红楼梦》”。所以网络上关于“红楼梦中谁是最幸福的人是谁?”的讨论意见千差万别,与以往的主流理解相去更远^③。

批评史和接受史研究所存在的这些不足,除了一些研究者观念上重视一流而忽视末流、重视精英传统而轻视民间传统的影响外,主要的原因在于资料的缺乏。因为来自底层人士的活动本来就不被人注意,很难得到记

① 霍国玲、霍纪平:《红楼解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② 霍国玲、霍纪平:《红楼解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序”第6页。

③ 参见李根亮:《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240页。